

我眼中的老领导吴学谦

黄桂芳

今年4月4日,是中国的清明节,一个属于缅怀故人的日子。我国外交战线杰出的领导人吴学谦同志,在这一天走完了他87年坎坷而光荣的一生。我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赶往他家吊唁并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老首长送别。学谦同志一生为人低调,在党内倍受尊重。他为人师表,是我们晚辈为人做事的楷模。

平易近人的领导

学谦同志1982年4月从中联部到外交部任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同年11月,任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除司机外,他没带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来。

1983年1月,组织上将我从事外交部新闻司调任吴学谦同志秘书,在他身边一直工作了8年。我第一次见到学谦同志是在1983年1月22日。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到首都机场迎接他出访归来。我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他握着我的手只说了一句话:“听人介绍过你,明天办公室见。”第二天,他把我叫来,问我在她这里工作有何想法?我说:“我从未干过秘书,担心干不好。”他

说:“我也从来没想到当部长。没关系,慢慢熟悉。让我们在一起工作吧。”

学谦同志早在1938年10月就投身于革命工作,曾是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学生运动领导者之一。但他从不以“老革命”自居,总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他对说大话、空话、套话很反感。那时,每次开部党委会,他总是希望与会者发言时“态度明确了,不要拖泥带水”。他自己以身作则,十分善于归纳会议要点,这让我在会后整理会议纪要要容易很多。

学谦同志就任外长和副总理期间,足迹遍布五大洲50多个国家。在外交活动中,他尊重对方,很少空谈,就问题谈问题。无论是第三世界的小国,还是欧美发达国家,他一概诚恳待人,平等视之,其务实作风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并因此交了很多国际朋友。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后任格鲁吉亚总统)、日本首相宫泽喜一、泰国外长西堤都与他有良好的友谊。1988年学谦同志访问英国时,杰弗里·豪曾专门请他至郊

外的官邸做客。

勤俭朴素 忘我工作

1986年,学谦同志一家搬进中联部的住宅区后,就再没换过。儿子曾多次向父亲提出,要把老房子装修装修,都被他拒绝了,他怕花国家的钱,“觉得这个房子住得挺好”。学谦同志辞世后,很多人去他家里探望。发现他家的房子和普通人家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更加俭朴。

学谦同志历来生活朴素。他任外长期间,夏天常穿的西服是由50年代在团中央时穿过的衣服改制的,还没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的衣服款式新。1985年,学谦同志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行李在托运时丢失了。我找到航空公司,航空公司方面说:“托运时皮箱散开了,我们看里边除了两件半新不旧的衣服,也没什么值钱东西,所以就没急运送去。”这个解释让我啼笑皆非。

为党、为国家“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是学谦同志终生的信条。他白天会见外宾、出席各种会议、找分管的部、司领导谈工作,下班后还要把参考资料带回

家继续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他常说，时间是有限的，要多留些给工作。

“文革”期间，学谦同志受迫害入狱近3年，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患了高血压、十二指肠溃疡等病症，需要长期服药。但他全然不顾，每天仍超负荷工作。1984年9月，学谦同志率团出席第39届联大会议。9月25日，他一整天几乎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小会议室度过的，先后会见了日本外务大臣安倍、埃及外长马吉德等12位外长。为了准备这一天连续的会见，他在前一天晚间会见两位来自欧洲的外长后就挑灯夜战，拟出会见提纲。第二天又起了个大早，亲自写出会见谈话要点。会晤外宾期间，见他满脸通红，生怕出问题，劝他稍事休息。他只在会见间隙喝点水，闭闭眼，就又打起精神继续会见下一位客人。

学谦同志始终坚持贯彻中央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和对台工作“八项主张”，正确判断台湾问题总体形势，指导对台工作。1988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1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学谦同志要出席并讲话。行前，他在中南海办公室突然脸色苍白，上吐下泻。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马上同北京医院联系，大夫要求马上送去急救。他却执意坚持说：“不行，我得去大会堂！”我们深知这场活动的重要性，且无法改变他的决定，便马上送他去会场。他强忍病痛，发表讲话。散会后，在我们催促下他才去北京医院就诊。急诊大夫火了，说

再晚点送来，后果不堪设想。他只好被迫住院治疗，住院时，他还老惦记着工作。

不搞亲疏 任人唯贤

学谦同志奉派到外交部工作时，我国刚实行改革开放不久，“文革”的一些后遗症还未全部消除，干部关系尚未理顺。学谦同志在党组（后改为党委）会上指出，我们应当切实贯彻中央拨乱反正指示，在外交部强调“五湖四海”，不搞亲疏。不管原先来自部队、党的地下组织，还是从地方、高等院校调来的干部，只要忠诚于党的外交事业、德才兼备的同志都要充分尊重信任，要敢于、善于团结他们一起工作。

学谦同志说到做到，从不搞小圈子，一直任人唯贤，提拔培养了不少年轻干部。有的年轻翻译，因为随行出访时表现突出，他就会向党委推荐，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总鼓励年轻同志积极参与业务工作。会见外宾前后，只要有机会就同他们交谈，让他们大胆上岗。他对干部司负责同志说：要注意重点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年

轻干部，对干部的使用不要搞“论资排辈”。他说，不能老让杨洁篪、周文重、李金章、翟隽等同志长期干翻译工作，要让他们到第一线去锻炼，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当年的“高翻”成为今天外交部领导和外交战线的骨干，与学谦同志等当年部领导的关怀是分不开的。

学谦同志在干部使用上十分重视老同志的宝贵经验，积极让他们发挥作用。那时，有些领导干部还未“解放”，他多次要求组织部门抓紧工作，让一些尚未恢复工作但历史清楚、经验丰富的同志早日投入业务工作。至今，有些离退休的大使回忆起他们当时重上外交第一线的情形，心情还很激动。

以身作则 严谨细致

长期的革命生涯，使学谦同志养成了工作勤奋、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作风。他在对有关问题作决定时，都会与周围相关同志商议，深思熟虑后才决定。

他写文章也是反复核实材料，一再推敲。他写的《解放前夜的上海学生运动》一文，被认



作者随吴学谦（左）访问归来。

为我党历史上不可缺少的珍贵史料。上个世纪 60 年代,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许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政党和其他进步组织都渴望了解中国, 要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交往关系。学谦同志遵照毛主席“需要出一些简单明了的非洲方面的书”的指示, 主持筹建了亚非研究所, 参与组织编写了供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的《非洲手册》, 周恩来总理对该书给予高度肯定。1963 年底至 1964 年初, 周总理出访亚非欧 14 国中的 10 个非洲国家时就带着这本书。

在处理外交文书时, 学谦同志更是慎之又慎。从内容到标题、标点都仔细审改。1984 年 9 月 26 日, 学谦同志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委员兼外长的身份出席第 39 届联大, 并发表讲话。行前, 他为确定演讲主旨, 反复研读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和近两年小平同志与外宾的谈话记录, 领会他老人家的理论思想。他几次分头召开地区业务司负责同志参加形势务虚会、讨论会, 在集中大家意见的基础上, 确定利用本届联大讲坛公开深入阐述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理论。他同拟稿的同志讨论多次, 并亲自修改、撰写有关段落。由于准备充分, 在此次联大上的发言十分成功, 受到与会者和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事后, 学谦同志对我们说: 要利用联大这个世界瞩目的讲坛宣传中国的立场观点, 每年开一次会, 不可能什么都说, 确定主题, 突出重点很关键。这篇讲话让人感到有新意, 就在于小平同志对当今世界的精辟判断, 各国

都很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在工作中就是要有“认真”二字, 稿子不要怕改, 越改才会越成熟。

注重调研 求真务实

了解学谦同志的人都说, 他是个调查研究的高手。1943 年, 华中局撤销江苏省委, 成立城工部, 他就在部内担任调查研究工作。解放后, 他在团中央国际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 一直很重视调研工作,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指导业务工作的思路。

学谦同志在外交部工作期间, 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每日要闻》、《新情况》(特字号) 等。为了让部、司领导能及早得知昨天晚上发生的世界大事, 每天一上班, 他就让新闻司值夜班看电传的同志到会议室向大家报告要闻。学谦、其琛等领导同志有时利用这个机会当场研究、布置上呈材料。当年参与报告新闻的同志每当忆及这段往事总感到这是部领导给予的难得的锻炼机会, 十分有助于他们提高政治敏锐性、全局观念和综合归纳能力。

学谦同志出差在外总要随身带着小收音机, 边吃早餐边听国际新闻。他说, 只有掌握世界最新动态, 知己知彼, 才能有的放矢; 孤陋寡闻, 就会成为新闻的“聋子”、“瞎子”, 既不能同外界沟通, 也不能很好地及时制定活动方略。学谦同志要求搞调研的同志一定要按毛主席对调研的有关论述去做, 注意去伪存真, 去粗取精。他多次鼓励和支持外交部主管调研的负责同志多召开小型的国际形势务虚会、中美、中苏关系研讨会等, 加大

调研力度。

每当学谦同志在文电中看到好的调研成品, 都很高兴, 常向有关同志推荐。例如, 1986 年, 驻尼日利亚大使馆报回《一定要让雄鸡在尼日利亚长鸣》一文。报文不长, 言之有物, 标题也鲜活。学谦同志看后欣喜地说: “多好的文章呀! 文中提到的‘雄鸡牌’蚊香既有助于驱蚊, 又让我我国企业获益, 这个传统市场不能让外国挤占。”他常说, 优秀的调研成品不在于以长取胜, 关键是要占有确凿的材料, 明晰问题所在, 提出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

1988 年 4 月, 学谦同志担任副总理后, 还分管旅游工作。他按照中央指示精神, 在调研的基础上, 根据我国国情, 首次提出了加强旅游业的软环境建设, 提高服务质量, 积极稳妥地发展我国的旅游事业。

1991 年初, 我奉派出国工作。行将离开时, 老首长给我鼓劲, 让我到外交第一线好好干。学谦同志对我说: “今天已是信息时代, 和以前比, 现在各方面消息都可通过媒体等各种途径迅速获得, 但尽快追踪国际、地区大势, 刻苦努力抓好调研的优良作风不能丢。”我在驻外使馆工作了近 10 年, 每次休假回国时去看望他, 老首长总要了解“前方情况”, 并一再交代我务必重视调研工作。1997 年底, 学谦同志对我说, 现在正在筹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1999 年 5 月成立后他任首任会长), 你以后回来也可参加这方面的工作。2000 年 6 月我退休后, 就来到这个基金会, 竭尽绵薄之力。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